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陈永贵疑案不疑	赵 瑜
【往事非烟】	亲历者忆“913”林彪坠机	纪 东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七）	吴中杰
【难忘岁月】	风起云涌的日子（下）	蒋国辉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陈永贵疑案不疑

· 赵 瑜 ·

有不少读者会问：当年陈永贵大红大紫，“农业学大寨”，口号响彻云霄。既然老陈坚定地站在刘格平和红字号一边，为什么，他不能力挽狂澜，拯救红字号挫败命运呢？——这个问题，直到几十年后我采访中间，仍时常听到。要回答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实际情况是，从1968年中期到1969年“九大”前后，也就是中央学习班里两派斗争高潮期，陈永贵自身也是风雨飘摇，还险些出了大事。他有短处被人家捏在手里了。在这段红字号最艰险岁月里，老陈同样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读者会问：陈永贵一老农民，到底能有多大个问题？且听我慢慢道来。

改革开放之初，我曾经想写一部反思学大寨运动的纪实文学作品。听说人们对陈永贵早年历史有说法，又听说，老陈去世后，其个人档案从中央转回了山西省档案局。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我找到了文艺评论家韩玉峰老师。韩老师当时在省委宣传部任文艺处处长，他热情地表示支持，说档案局就在同一所大院里，局长也熟识，咱们一块儿找他便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档案局长告知：陈永贵档案确实转回了山西，但我们根本无权保管，更无权拆看，而是奉令转运到大山中档案国库了，这所深山国库，驻有重兵把守，直属中央管辖，我省无权调动库中任何材料。并且说，中央对于调看陈永贵档案还有明确规定，即必须经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山西省委也没有这个权力。得到如此答复，我只得作罢。

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写作计划流产了。而我对于陈永贵诸事，仍然保持着关注。1993年，我还深入大寨，编导摄制过一部关于大寨的纪录片。二十多年来，看到关于老陈历史问题诸多版本，说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做过汉奸，均不甚详尽，亦不敢轻言。及至后来看到谢振华将军自述和另外两本书，叙述扎实，又可以相互印证，才觉得说清了问题，应是可靠的。同时也明白了文革中，陈永贵在全省同一派战友最低潮时，被动原因究竟在哪里。

这两本书，一本是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百战将星》丛书，其中一本《谢振华》，由军旅作家欧阳青先生担纲撰写，他直接采访了谢振华将军，写清了陈永贵历史问题来龙去脉；另一本，是中国文联出版社1998年《文盲宰相陈永贵》，撰写者是新华社资深记者冯东书先生。

其他种种版本，虽有相关呼应，却不及这两本源于第一手资料的著作可靠。

陈永贵，究竟是不是一名为侵华日军效力的有组织的成员呢？

先看《谢振华》一书。作家欧阳青写道：“1968年初秋，全国搞清队整党，为党的九大召开作组织准备。谢振华在负责山西清队整党工作时，查出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无形中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事情的起因，是解放军驻晋‘支左’领导小组办公室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揭发了陈永贵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日伪组织，充当情报员的历史问题。”

冯东书亦在书中写了相似的情节：在1969年春九大召开以前，陈永贵“对自己在日军占领昔阳时，当过村里的伪代表，参加过日本人组织的兴亚会，心里有点儿发虚。他心里没底，怕成为重大政治历史问题。……阳泉市清理阶级队伍，有几个昔阳籍的人被查出参加过日伪兴亚会，有人把他们视为汉奸，他们害怕挨整，便扯出了陈永贵，说陈永贵也是兴亚会的，他怎么就没事？阳泉市当时是69军一个师级干部在那里当领导，就把陈永贵这个情况反映到了军党委和省里。”

接下来，欧阳青书中说：“具有丰富的安全保卫工作经验的谢振华闻知此事后，非常重视。他对办公室的几位知情同志说，我们要重调查研究，查清事实再说。目前要严守秘密。……谢振华与‘支左’领导小组的几位负责同志商量后，决定责成北京军区保卫部在山西‘支左’的刘旭等三名同志，负责查证此事。

“刘旭等人立即奔赴阳泉市。通过查证，他们在阳泉市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的个人档案中，发现1955年镇反时，他交待自己曾参加昔阳日伪特务组织兴亚会，并当过情报员的罪行材料。同时供称，情报员中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还有大寨的陈永贵。于是，刘旭又翻阅查证王久荣的档案材料。王久荣原是大寨公社金石坡人，他的供认记录也承认自己参加了兴亚会，并交待陈永贵还是他们情报小组的负责人。”

冯东书先生在书中说：“抗日战争中，日本人为了他们侵华战争的需要，引诱和强制当地农民参加他们的一些组织，这是他们‘以华制华’政策的一部分。参加者中有的很坏，日本人投降后被镇压了，陈永贵的这件事，在昔阳县档案中早有记录，并不是文革中才发现的新问题。……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他太了解这件事了。他在1963年采访大寨时，就在昔阳县看过陈永贵的档案，早就知道陈永贵历史上的事。”

欧阳青书中接着说：“为了弄清事实真伪，调查组刘旭等人，又查证了抗日战争中八路军129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确有陈永贵的名字，并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还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陈永贵每周去昔阳城两次，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为此，当地群众给陈永贵取了个绰号，叫他陈二鬼子。抗战胜利后，昔阳群众对给日本人干过事的人特别痛恨，用石头砸死不少这些当过汉奸的人。陈永贵非常恐慌，也担心自己被砸死。于是，他向大寨第一任共产党员村长赵怀恩托孤，请求村长保护他的子女长大。赵怀恩比较实事求是，为陈永贵说了好话。……陈永贵终于保住了性命。——调查组的结果是：确有此事，证据确凿。于是，立即向谢振华汇报……陈永贵得知后，主动找谢振华交待了自己的这段历史。”

冯东书先生也写了，陈永贵“主动向省里说了自己的这个历史问题”。欧阳青在书中继续写道：“当时，谢振华把陈永贵约到太原迎泽宾馆谈话。在宾馆第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陈永贵主动向谢振华司令员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他说：‘谢司令，我有罪，我要到北京向毛主席请罪！’”

“谢振华心平气和地开导他：不要着急，有什么问题可以详细谈出来。陈永贵低声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1942年被日寇抓去，后来被迫参加了日伪情报组织兴亚会，给日本人送情报，我是三人小组的负责人。’”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谢振华将军，抗战时期正在山西。他在担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二科科长之后，转在周恩来属下，担任“第二战区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科长，与阎锡山势力打交道。之后，转战刘伯承、邓小平属下，出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1938年，邓小平调谢振华任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副部长兼党的书记，专门开展太行山区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抗战后期，谢振华担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军工作训练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也就是说，在1940年7月，毛泽东亲自谈话，派谢前往华中地区担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兼组织部长之前，谢振华在山西对日抗战前线，干的正是对付日伪敌特这一行。阳泉、昔阳均在太行山区，距离武乡县八路军总部并不远，谢振华对那里的敌特情况实不陌生。

1949年以后，谢振华又在华东军政大学担任过基本系和情报系的领导工作。当时，陈永贵前来相谈自己的历史问题，作家欧阳青写道：“老保卫科长出身的谢振华提问题会抓关键，他单刀直入地问陈永贵：‘你送情报和什么人联系？’陈永贵回答：‘是和日本阳泉宪兵队的清水队长直接联系，规定每周去送两次情报。不过，情报有真有假……’”

“谢振华认为问题已经非常清楚了，于是，让陈永贵先回去，安心工作，要相信组织，不要有过多想法。随即，谢振华召开69军党委会，专门研究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最后决定，严格按中央指示和原则处理此事。1968年9月，谢振华派赴京出席全国军工会的副军长李金时，专门将陈永贵的问题呈报周恩来总理。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说：69军的同志要顾全大局，不要扩散，影印件可报中央。李金时从北京开完会回到太原，立即将周总理的指示向军党委作了传达，并把有关事宜向谢振华作了汇报。12月，69军正式以军党委名义，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北京军区党委，并转呈中共中央；不久，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谢振华又当面向总理请示有关陈永贵出席党的九大代表问题。总理说：‘要维护大寨红旗，此事作为历史问题来处理。可让陈永贵当代表出席九大，但只当代表。’”

欧阳青先生最后阐明：谢振华作为山西九大代表资格审查负责人，“坚持原则，秉公办事”，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在派性斗争万分激烈情况下，还是把陈永贵作为农民代表，报他出席九大。并且严守了这一机密。陈永贵在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冯东书先生也在书中说：“谢振华知道陈永贵这件事后，没有公开拿出来做什么文章”，而是“通过军队系统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报告到北京军区党委，并请转报中央。”

疑事讲到这里，一切都很清楚了。看来，陈永贵给日寇做过情报员，当过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并且是一个负责人，确属事实。而在69军审查陈永贵问题前后，正是中央学习班里两派斗争紧要关头。军队暗查陈永贵，出手如剑。不难设想，唯在此时，陈永贵已经不再是“根红苗正”巨大王牌，他必将谨慎言行，不敢大张旗鼓地为红字号撑腰张目，还要主动检讨自己存在着派性错误。还有周恩来等中央大员在1969年春节除夕之夜，即2月1

6日晚，召集杨承效等山西两大派头头解决问题，周恩来当众批评了陈永贵有派性，这正是69军及北京军区关于陈永贵历史问题报告之后，不久便发生的事。当时，陈永贵检讨了自己的派性，杨承效一派在会上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马上指出：“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并说了很重要的一番话。后章另有详述，周恩来的批评，很快便公诸于世，这已经相当严重了。毛泽东号召全国学大寨，谁敢批评陈永贵有派性？那不是“反大寨”吗？在当时，“反大寨”这顶帽子是很重很重的。而周恩来在这时——九大召开前夕，公开批评陈永贵，且毫不客气，必定有其充分理由。陈永贵有短处捏在别人手里，面对批评，他哪里还敢公开为红字号一派撑腰说话？何况红字号还被指责为“反军”派呢。

我还看到过另一份材料，说陈永贵参加了“九大”，当了中央委员，周恩来曾找陈谈话，告诫他一定要谦虚谨慎，给陈讲解“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大意是说，如果不是毛主席支持大寨，你的腰杆子并不那么硬嘛！

中央以及军队首脑们没有查处陈永贵，没有追究其历史污点，无非是为了维护毛泽东“农业学大寨”决策而已。总不能让国内外笑看，伟大领袖树了一杆红旗，掌旗人却是一名日寇兴亚会情报组长呀。

从军队作家欧阳青和新华社记者冯东书笔下，我们知道了陈永贵历史问题真相。那么，谢振华本人对此又是怎样看待的？他在晚年对陈永贵其人有说法吗？有。谢振华将军“1992年1月31日写于昆明”的一篇自述，题目是《难忘的回忆》。此文于1994年4月印刷成册。谢振华在文首写道：“我已经是七十八岁的人了，有责任将‘四人帮’这些罪恶历史和已收集到的十一篇客观文件，作为历史证件一同编入，送存归档，以供后人鉴别。”在自述长文中，谢振华详尽回忆了当年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一事，内容与欧阳青和冯东书著述相一致。我发现其中一处稍有区别——谢振华写道，我约陈永贵在迎泽宾馆六层中间靠左边的一个房间里和他谈话，“他一坐下，痛哭流涕地说……”，而欧阳青书中没提陈一坐下即“痛哭流涕”这句话，为陈永贵省略了一个辛酸细节。其余对话，则是相同的。

大江流日月，逝者如斯夫。陈永贵历史疑案，便是如此了。但令人思索之处还有几点：一是新华社记者范银怀等人，早在文革前调研大寨事迹时，就把陈永贵历史问题从昔阳县档案中看的明明白白，那么，在树立大寨典型时，新华社是否向省里向中央禀报过此事呢？上头又是如何对待的？此其一。第二，文革中，69军党委和北京军区将陈事报告了周恩来并转中央，那么，毛泽东本人是否知晓？又是如何对待的？保密乎？保陈乎？第三，陈永贵在“九大”做了中央委员，在“十大”做了政治局委员，继而做了国务院副总理，可谓一路攀升，并无大碍。这中间将要历经多次考核审查，老陈又凭什么平平安安过关？要说毛泽东始终不知其底细，当然说不过去。有朋友对我分析说，世人皆知毛泽东，只要斗争需要，从来不按常理出牌，农业国策既定，坚守公社化体制，大寨就是红旗，他还在乎陈永贵历史上那点事儿吗？还有一个观点，包括谢振华将军也这么认为：只因江青体系把陈永贵当做了有用之人，可以为其“政治目的当打手”所以才拉拢他扶助他。……这一切，唯有留待后人补正，留待史料公开了。

写起以上段落，时在2006年冬季。末尾说，“这一切，唯有留待后人补正，留待史料公开了”，这话还有些功效。六载光阴逝去，现在是2012年9月，我再度提笔，将近年间搜集到的有关陈永贵历史问题新材料，诉诸读者。以下内容，可以看做本节前面段落的补充。

《光明日报》有位著名记者，名叫陈英茨，晚年著有《陈永贵本事》一书。陈英茨先后做过报社理论部和群工部主任，秉笔平生，著述谨实；早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决议由复出后的黄克诚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次年春季，由中纪委张启龙、魏文伯、张策等几位副书记提议，黄克诚拍板，针对山西诸多问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中纪委山西工作组。组长由中纪委专职委员毛铎担任，抽调军队干部孟苏民和《光明日报》陈英茨等骨干力量，于1979年4月14日进驻太原。先住并州饭店，后在迎泽宾馆。工作组任务很重，其中一项使命，就是重新调查、甄别陈永贵的历史问题。10年前，69军党委曾将这一问题呈报中央，之后文革动荡，老陈升迁，此事并未得到再落实，也未见正式结论。工作组派赴山西时，陈永贵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因此，工作组展开调查必须慎之又慎，更要排除极“左”影响和派性干扰。

陈英茨先生正值中年，身为工作组重要成员，全程参与了这次调查。《陈永贵本事》一开头，即从这里切入。该书经过数年征求意见和慎重修订，于2008年5月由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正式出版，李锐先生为其写了很长的序言。此书分量深厚，史实清朗，走笔确凿，亲历调研，是可以采信的。为简短计，以下摘选书中材料，尽量不与前文重复：

书中写道：工作组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一是陈永贵老家——昔阳县石山村的群众；二是解放前在昔阳县活动的我武工队和地下工作人员；三是陈永贵为日伪从事情报活动的同案人；四是知道陈永贵曾向日本宪兵队递送情报的知情者。所有揭发、举报都经过了认真核实，并且都不是孤证。有些事实因没有过硬证据或仅为孤证的，则留下来‘存疑’，未算在陈永贵头上。全部材料是实事求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这显然是一次独立专案，是另起炉灶从根部查起，69军的材料只是线索与背景。

事毕，由直接负责这项调查的工作组成员孟苏民，首先写出一个调查报告初稿，然后按照毛铎指示，由陈英茨参与修订，依据孟稿，再出一个更严密的正式报告，这才报送中央审核。

从书中可见：陈永贵生于1915年，原名陈荣贵。父亲陈志如，好赌，没有给后代留下土地。为还赌债，先卖了女儿，又将怀孕的妻子卖到和顺县杨家。因而受村人歧视，遂带六岁的陈永贵离开本村，转迁大寨度日；陈永贵没能读书识字，年龄稍大，即被送往平定县“长成油盐店”学徒，复到“福成油盐店”学徒，亦好赌。两被店主解雇，又去烧饼铺当伙计，及至自己打烧饼，自打自卖。有时在平定，有时在昔阳、大寨；再大些，陈前往太原做工一些日子，下煤窑挖煤一些日子，贩卖牲口干牙行一些日子，反正干啥也不长。他既不是守家在地的农民，也不是凭借技术吃饭的工人，属于无传承土地、无固定职业、无恒定财产的城乡贫困游民，理论上被称为流氓无产者。

转了一大圈儿，陈永贵转回了昔阳乡下。这时候，日寇攻陷太原，侵占山西大部，鬼子进村了。1938年以后，驻昔阳日军有一百多人，其统治要靠伪军驻守，要靠汉奸维持，各村还要出一名村代表，履行伪村长职责。

大寨村当时几十户人家，近200口人，无论贫富，谁也不愿意出头担此“重任”。陈永贵适从外面回来，“胆子大”，便担当了大寨伪代表一职。书中说他就此“成了一村之长，有权有势了，尤其是由村里的地主、有钱人供他吃喝，再不用为生活发愁和奔波了”。附近几个村庄，也无人出面担当此职，“陈永贵便成了这几个村子的联村代表”。

日军成立“兴亚会”，全名叫做“振兴东亚和平救国灭共会”，在昔阳县先后归属宪兵队长岸田、清水利和池尾工藤领导，系日寇外围特务组织。陈永贵被日军抓到“本部”威胁

利诱，在当年日伪档案中的记录是“归顺释放”。从此，陈永贵成为“兴亚会”昔阳负责人之一，并发展组织成员，“主要任务是刺探我八路军军情，陈永贵成了本部主要骨干。后来，本部搬到阳泉，陈永贵每周至少到阳泉去送一两次情报，因此，阳泉不少人认识陈永贵，叫他二鬼子。……出入本部的人有一块小牌，没有小牌的人是不能随便进出本部的。在昔阳做地下工作的老中医郭毓文，就知道陈永贵有过这样一块牌子。”

工作组证实，陈永贵在日军宪兵队的登记表上确有实名，年龄为23岁。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在《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撰文，披露日伪侵占昔阳，敌我斗争极残酷。日寇抢粮2100万斤，牲畜29000多头，杀害青壮年5000多人。而各村被害人最多的，要数大寨。全村不足200人，竟有27名青壮年被杀害，还有非正常死亡35人，合为62人。受害者比率畸高；另一惨案是，日寇袭击西峪村我军驻地，致我军民牺牲300余人。书中说，“据村民反映，有个卖烧饼的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过，不几天就发生了这次大惨案。人们认为这个卖烧饼的人就是陈永贵”。工作组对这两起涉嫌陈永贵案，暂不认定，列为“存疑”。

书中明确写道：陈永贵“是为敌人最卖力的一个。因此，我地下工作人员曾向武工队负责人赵晋奎、高如晓建议除掉他。当时确定要镇压的三个人中，就有陈永贵。……后来八路军的政策改为以争取为主，镇压为辅，才没有杀他”。

陈永贵之子陈明珠，在《山西文史资料》1995年第5辑，发表文章《我的父亲陈永贵》，也讲了其父当过大寨伪村代表。

新华社记者范银怀撰文，写明自己奉总社之命，于1964年9月，到昔阳去，为确立大寨典型做前期调查，曾在县委组织部查看陈永贵档案，在陈党员登记表《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一栏中，亲见填写了“兴亚会”三个字。对此，陈英茨等人在工作组查实：在文革中陈永贵掌权期间，“陈永贵的秘书和昔阳县委组织部长，将陈永贵旧的整党登记表抽出，又填了新表塞入档案，伪造了档案材料”；为了反调查，陈永贵曾在昔阳一招东楼南套间内，与李韩锁、前后两任秘书、一名县委副书记，开会研究多项事宜。如研究陈永贵被日军抓捕的最佳时间，要与烈士王居仁就义时间吻合，表明陈是与抗日志士一起被捕的，以便与陈永贵自编“被八路军营救出来”的说法相一致，然后拟就补充材料，装入档案做假。

对于前述69军在“九大”前查证陈案一事，陈英茨先生也在书中补充了不少情况，更具体地理清了69军当年办案的来龙去脉，证实以谢振华为首的69军党委是求真慎重的。

书中可见：时任69军207师副政委、阳泉市委书记的周云涛回忆说：“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时间是1968年9月份，发现了陈永贵的历史问题。当时，阳泉市商业局核心小组副组长王敏，向阳泉市武装部副部长王牛孩，报送了一份1955年“肃反”档案材料。内中有商业局炊事员李观海（大寨乡武家坪村人），用毛笔竖行写在毛边纸上的交待材料。李坦白自己在抗战时期参加了“兴亚会”，给日伪当情报员，同案中有阳泉市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大寨乡金石坡村人），领导是陈永贵。王牛孩将这份“肃反”档案报送到我这里，我看后感到事关重大，当即做了三条指示，一是调查此事的专案组立即解散，向已经知道此事的人讲清楚，不准扩散；二是命令公安局把李观海关起来，保护性的；三是立即向军长谢振华报告。

谢振华将军长接到我的报告，立即派69军政治部主任、山西省支左办公室主任甄连兴同志，从太原赶到阳泉，拿走了这份档案……

周云涛表明69军调查陈永贵历史问题，起源于1955年“肃反”档案原始材料，是第一手的东西。周云涛当时是阳泉市党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主要负责人，后任河北省军区副政委。

接下来，69军谢振华军长、曹中南政委审议了甄连兴取回来的“肃反”档案，马上召集山西“支左”领导小组几位负责人开会，决定对此事要严格保密，同时责成身在山西“支左”的北京军区保卫部刘旭等三人展开复查。对象包括档案中提到的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查王在“肃反”中的供认原始记录，与同案李观海交待吻合；进而查阅原八路军129师锄奸部“昔阳县情报人员花名册”，和现在敌伪档案，“陈永贵大名都在其中，并注明他是伪村长、兴亚会昔阳分会负责人之一”。对此，刘旭小组向69军党委上报了复查结论：“确有其事，证据确凿”。

除了李观海、王久荣之外，还有一个参加过日伪兴亚会的案犯，名叫赵新元，曾被政府判处八年徒刑。文革中赵还活着。书中披露：“陈永贵亲自找到赵新元，当面对赵说，你还认得我吗？赵说怎么不认得，你是陈永贵。陈永贵说，如果有人调查兴亚会的事，你就说我是一般成员，不要讲我是头头。而赵新元事后讲，我没有答应陈永贵的要求，我还是实话实说的。”

69军党委查清陈案后，即派副军长李金时赴京向周恩来汇报，周作出“复印件可报中央”等指示。据此，69军重新整理正式材料，时在1968年12月。这份报告，由69军政委曹中南指令军政治部赵志祥为主执笔完成，然后报送北京军区党委呈转中央。这位赵志祥后任石家庄市政府人事局局长，足资证明。

关于陈永贵去迎泽宾馆向谢振华“痛哭流涕”当面承认“我有罪”一事，陈英茨先生也在书中增添了佐证。当时，除谢振华听取了陈永贵认错外，身在现场数人，尚有谢振华秘书苏林，后任国防大学教授；有69军政治部主任甄连兴，后以军副政委一职离休在保定休干所；有69军政治部组织干事黄祥初和政治部保卫干事冯阁林等。诸人回忆的地点，是迎泽宾馆603房间，时间是1968年11月底或12月初。

另有一些令人感到苦涩的情节，这里也顺势一谈。文革中期以后，尽管陈永贵从山寨升到了中央，身居显贵，如日中天，但他对自己抗战中“那点儿事儿”，总是放心不下，当今词语叫做“纠结”。范银怀先生在《炎黄春秋》1999年第5期发表《陈永贵过“关”记》，文中说，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洪文、纪登奎、倪志福、陈永贵等人接见山西代表，陈永贵见到山西人，忍不住抱怨：“到现在还搞我的历史背景！”王洪文回应：“搞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材料，不是小事，不是一般问题……谁搞的，关起来！”——就这么一个态势，在山西，在晋中，在阳泉，在昔阳，一批曾反对和揭发陈永贵的人，吃尽了苦头。

还有一个情节也很苦涩，是《陈永贵本事》一书披露的。众所周知，华国锋主政时期，遵从毛泽东方针路线，坚持农业学大寨，因而关心陈永贵的命运。而陈永贵向华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却不敢讲实话。他向华国锋递交报告，竟说昔阳县石山村老家，有两个陈永贵，当汉奸的是另一个陈永贵，不是我。陈英茨对此评议，“陈永贵在华国锋面前，真是昏了头脑，乱了方寸。说有两个陈永贵，那个陈永贵是谁？多年来他就这样讲。陈永贵这个一贯说谎的骗子，竟当面骗起了中央主席来了。”想一想，的确难为“永贵大叔”了，历史上一个基本事实，硬梆梆摆在那里，实在让人编排不圆啊。

陈永贵历史问题，讲到这里已经非常清楚了。以毛铎为主、有陈英茨等人参加的1979年中纪委山西工作组，完成了使命。补充一句，这次工作组赴晋，还结合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及省公安厅负责干部，与毛铎共同组成了领导组。因此说，王谦书记也是知情人。一起参加工作组查案者，尚有省纪委增派的一名大学生，“这位同志后来在山西省纪委和有关厅局担任重要工作”。

毛铎工作组回京汇报后，中共中央对陈永贵历史问题十分重视。为慎重起见，高层又相继两次派出调查组对陈案再做复查。一次是中组部调查组，一次是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调查组，为期一年多结束。最终取得一致意见，认为陈永贵在抗战期间事故一案，“准确无误”。

除了谢振华、欧阳青、冯东书、范银怀、周云涛、陈英茨等多人的文章及著作，另外还有更权威文献可做结论：如果，审查党员干部最高权威机构——中共中央组织部有了定案结论，进而以中共中央文件形式正式转发，即构成了执政党正式公文，也就是十分严肃的历史文献了。

根据1969年4月中共“九大”前夕69军党委首次对陈案做出调查报告，又据1979年4月以后中纪委工作组、中组部调查组、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调查组，对陈案做出的三次调查报告，大的事实趋于一致。据此，1980年11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做出了《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确认“陈永贵同志在入党前，历史上有三个问题”：一是“关于当伪村代表的问题”，二是“关于参加兴亚会的问题”，三是“关于被日伪警察所逮捕的问题”，基本事实清楚。中组部从轻发落，对前两条定性为“属于一般历史问题”，对第三条结论为“这次被捕没有问题”；陈永贵对此《审查结论》签署本人意见，写了“同意。陈永贵1980·11·6”字样。

很快，1980年12月，中共中央正式转发以上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形成了《中发〔1980〕85号文件》，多年来围绕陈永贵历史疑点的传闻与争端，可以平定了。

当月，即1980年12月，山西省选举中共十二大代表，陈永贵因是上届政治局委员，按照惯例至少应该当一名代表。但在选举中，陈永贵仅得到27票，反对票高达309票，落了一个27：309的悬殊结果。这位显赫一时的人物，终于被故乡大多数共产党员抛在一旁了……

从中央发文批转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至今三十多年，人们对文革惨案，对强迫学大寨，对陈永贵生平污点，竟已淡忘。以致对与错的坐标模糊颠倒，孰是孰非失去了界线。不久前，从学术上反思研讨陈永贵历史问题的学者，居然成了诽谤案的被告，受到了所谓法律上的整治，真是咄咄怪事，匪夷所思。而当前学界出现全局性犬儒化倾向，奋起呼唤真理的声音异常稀薄，很令人沉痛。

陈英茨先生在《陈永贵本事》前言中说，“近年来，关于陈永贵与大寨的出版物，还在对大寨和陈永贵歌功颂德。……作为知情人之一，我不能再沉默了，我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告诉全国人民。”殊可叹，中国十五年学大寨，并非农民自发而来。这场运动，实在是毛泽东为掩饰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失败而发起的。李锐先生在陈著“序言”中说的痛切：“陈永贵在政治上的发迹，步步高升，是伴随毛泽东日益偏离‘八大’的正确路线造成的，并于文革中达到顶峰。……一个半文盲、基层农村干部，居然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兴风作浪，翻起一片乌云……是当年阶级斗争为纲、砸烂一切的政治上的需要。水平低、素质差、能力弱、没

文化，这些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一曰声气相求，二曰满腔愚忠。……陈永贵造反夺权在昔阳县，之后一两年拉杆子搞武斗，游走的地盘也限于山西晋中地区。而‘九大’跃身龙门后，解放前他几十年浪迹社会底层形成的劣根性，即我国自古相传的游民意识、痞子精神，才得以带到国家政治活动中。陈永贵攀附在文革这根毒藤上，吸吮着它的毒汁，与日俱强，与时俱进。……对文革罪孽的清算，不知为什么总是有人讳莫如深，难道是怕动摇执政党的政治基础？或是担心利益集团的整体颠覆？滋生毒瘤的母体如不刨根，会不会萌发新芽呢？真令人担心啊……”

最后一个老话题：69军查证陈永贵“历史重案”又经北京军区报呈中央，毛泽东等人到底什么态度？文革酷烈，许多人历史上仅仅一星半点小嫌疑、小瑕疵，都绝难过关，老陈当过伪村代表，是县里“兴亚会”头头，案子不轻，又该怎么办？对于这个问题，前文谈过几句，后来也有了补充材料，现在一并写给读者。

先看陈英茨在《本事》一书中的说法。陈英茨认为，“中国有个投鼠忌器的传统。陈永贵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讲陈永贵这些丑事，必然影响毛泽东的威信，所以这些丑事就被长期掩盖起来了。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个穷人，他的那些丑恶历史可以谅解。后来，有人又把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说成虽然是敌我矛盾，但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矛盾性质可以相互转变，“全凭领导人一句话”。这是陈英茨先生的观点，但不甚具体。

再看范银怀先生在《陈永贵过“关”记》中的说法，则是有名有姓的。范银怀写道，此案“关系到陈永贵政治命运的问题，与他一起造反掌了权的战友都捏着一把汗”。到了江青“炮轰”谢振华、曹中南的1974年，各派对于查证陈案并报告中央，算不算“整黑材料”问题，斗争对立，又起风波。范文说：“正在争执不下，传来了毛泽东的声音。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文革中能够直接听到毛泽东指示的军政要员。他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向69军领导传达毛泽东的声音：陈永贵历史问题，主席知道了，不要再提了。——毛主席知道了，这在当时如同下达了圣旨，谁都不吭气了。……这是当做绝对保密只在少数有关的高级军政领导中传达的。”范银怀先生还写道：“据说，毛泽东认为陈是受压迫的穷苦人，所以对陈永贵的历史问题不予追究，保护过关”，“陈锡联代表中央作解释工作，说自己抗战初期就在昔阳一带打仗，那时的玉米长得只有膝盖那么高，现在长得一人高。他语重心长地说，农业还得靠大寨！陈永贵又一次有惊无险，不仅未追究历史问题，反而平步青云。”

范银怀的文章同时披露：当69军查证陈案时，陈永贵与同派的张怀英，很快就拟就了一套说法。张怀英表明自己长期在昔阳工作，了解当地抗战中社会情况，极力为陈永贵开脱。张怀英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和知情人的名义写出材料后，即由刘格平呈报给中央文革小组。刘格平还将这件事告诉了陈永贵。

这个罕见的情节使我联想到，很可能，刘格平所报送的张怀英材料，到了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那里，与69军材料构成了某种抗衡，对陈永贵“九大”当代表，起到了过渡和保护作用。张怀英在关键时刻保护住老陈，也就保护了自己，并进而保护同一派与对立派斗争下去。

然而无论怎么说，当红字号和联字号血火交战最激烈的时候，陈永贵尚且只是一个省级常委，在中央没有任职。他本身历史上不干不净，这时还得别人保护他，靠巨人帮助他。

“九大”前后的老陈随同诸多省常委进京，始到高层亮相，他可不敢也不便拍脯子保护红字号。1968年北京“十二月会议”解决山西问题，重新对省常委进行分工，给陈永贵分管的职责唯有四个字“大寨工作”。

总而言之，中央学习班前后，红字号一派，不论是太原的杨承效，还是阳泉的安克、梁保贵，包括晋东南的程首创等等，都没有沾上陈永贵什么光，而是溃败下来并且无可挽回。陈永贵，只因有毛泽东罩着他，才渡过难关，没吃什么亏。到林彪出事，中共匆匆召开“十大”时，也就趁势走红了。

□ 摘录于赵瑜：《牺牲者》

~~~~~

### 【往事非烟】

#### 亲历者忆“913”林彪坠机

· 纪 东 ·

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出境后，总参、空军等有关部门报来的信息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中蒙边界44号界桩两边的地域内，蒙军的雷达联络频繁，情况异常。总理让我通知空军、通信兵和总参有关部门带相关资料和地图到大会堂东大厅汇报。总理对我方和蒙方的兵力部署、雷达分布看得非常仔细。经分析，初步认定：这里蒙军雷达活动异常，与林彪座机出境有关。当时总理好像有一种预感：虽然没有飞机的消息，但蒙军这个地域的雷达联络频繁，说明这一地域有重大情况发生。他提出，加强这个地域的资料搜集工作，认真进行分析，有什么异常情况及时报告。我参加这个汇报会时心里有些紧张。与会人员都不认识，而且只有总理一人听取汇报，我一个人在里面招呼。我没有忘记张树迎的提醒，打破常规，坐在了总理身后离他最近的位子上。他看地图时，我也站在他的身边。一是怕他太累，身体支撑不住，一旦有事，我可以快速反应；二是怕有心怀叵测的人有什么动作。后来，随着林彪叛逃专案审查的逐步深入，从有关材料中看到，那天参加汇报的人员里，还真有空军的一个与“小舰队”有关系的人。

9月14日中午，多项必要工作都部署完毕，73岁高龄的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已连续工作达50多小时了。而且在那种形势下，总理也不可能安静下来吃一顿饭。我们几个工作人员的神经也始终处于高度紧张之中。说实在话，当时只知道大会堂的灯一直是亮着的，不看手表的话，连白天、黑夜都分不清楚。我们多次劝总理稍微休息一会儿，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报告就是了。总理终于同意了，医生给他服了安眠药，他就在西大厅西侧北端小厅的床上睡下了。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和我四个人和衣而卧，躺在小厅门外的地毯上，但谁也没睡觉，谁也不说话，或瞪着眼睛，或闭目养神，估计几个人心里想的都差不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9月14日下午二时左右，我接到外交部王海容的电话，她说：“外交部收到一份我驻蒙使馆的特急报告，要送总理。”我说：“总理已经50多个小时没休息了，刚吃完安眠药睡下，请你请示一下鹏飞同志，要不要叫起来。”姬鹏飞同志是外交部代部长，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不一会儿，王海容又来电话说：“姬部长说，马上叫醒总理。”我即回答：“那好，我去叫总理起来。你现在就到大会堂北门来。”我对张树迎、高振普、张佐良说：“外交部有紧急报告，要叫总理起床。”

不一会儿，王海容到了大会堂北门，我接了报告，请她进来休息一会儿。她说：“不用了，要马上回部里。”

我拿着这份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的报告急奔北小厅。总理已经起床了，穿着睡衣正在卫生间洗脸，看我进来，马上甩了甩双手上的水珠，用毛巾擦了擦手。这时，我已把信封内的报告掏了出来，递到总理手上。开始，只见总理眉头紧皱，随着目光在文字间移动，脸上的紧张神情逐渐舒展开来。我看到他拿着报告的双手在微微颤抖。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着我，兴奋地说：“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我见总理这么兴奋，马上从他手里接过报告粗略地看了一遍，记住了如下内容：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13日凌晨2时30分左右坠在肯特省贝尔赫里县境内，机上共有9人，全部死亡……在我看报告的时候，总理对我说：“我要到118号房间主席那里去报告，你也跟着我。”说完，总理换了衣服，带着高振普和我向大会堂118号毛主席住处走去。当穿越一道走廊，到了一个小门时，总理对我说：“小纪，你留在这里等我，我回来一起回去。”

总理想得周到啊，这个时候，在大会堂只有总理和我知道林彪的下场，他担心我兴奋起来，或是熟人问起来，在没向毛主席报告之前，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散布出去，于是，让我在这里等他。我看了看，这个走廊很长、很高，一个人也没有，真有点怵人。

约二十来分钟后，总理回来了。我看他步履轻松多了，紧蹙的眉头也舒展开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机毁人亡的消息，并宣布在大会堂的政治局委员可以回家了。

林彪集团的重要成员、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听到这个消息，离开大会堂比谁都快，急忙往家赶。总理立即叫我把他叫回来。我在大会堂北门下台阶的地方追上了黄永胜。总理和他又谈了二十多分钟他才出来。后来得知，他回家后就烧罪证材料，把一个铜盆都烧裂了。

对于黄永胜，我在“九一三”事件后曾听总理说过：“从北戴河事情发生，我就让他始终跟着我在大会堂，我给各大军区的领导通电话，也让他听着。黄永胜当时没敢轻举妄动，也没有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直到9月24日，中央决定，把他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一起离职审查。”

14日晚7时左右，总理回到西花厅。

在还没有接到我驻蒙使馆的紧急报告之前，总理除不断了解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外，还带上卫士和我坐车到广场四周转了一圈。看到庆祝“十一”的游行队伍正在照常训练，他心里坦然了一些。他也许在想，只要国内安定，外患岂能乱我中华。

□ 摘自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  
【难忘岁月】

复旦往事（选载之七）

• 吴中杰 •

(上接 1910c)

▲ 我们犯了“可恶罪”

一两天内，各路人马都调集回校，而且立即被驱赶上阶级斗争的新战场。

被称为复旦南京路的校区主干道两旁的大字报栏早已修缮一新，其他凡是能搭大字报栏的地方也都加搭了新的中字报栏，如食堂前面，各系办公楼前面，学生宿舍楼前面，等等。而且，所有大字报栏上很快都贴满了大字报，气势之盛，只有两次炮打张春桥的场面才可与之相比。所不同的是，炮打张春桥是学生自发的行动，所以大字报东贴一张，西贴一张，琳琅满目，自由活泼，而“一打三反”运动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行动，大字报也显得整齐划一，有如墙报。

我到食堂吃饭，必须经过一部分大字报栏，虽因身后跟着看管人员，不能驻足细看，但略一浏览，就知道重点在整“胡守钧小集团”，而且我也有幸占了一个专栏。大字报给我扣了许多帽子，什么“胡守钧集团的出谋划策者”、“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刁德一式的人物”等等，这些原是张扣发在大会上奉送的，一到中文系秀才们的笔下，又加了许多文学性的语言，写得有声有色，但似乎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认定我是“胡守钧小集团”的重要成员，或者说，非要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来整不可了。

这使我感到冤屈，同时也在沉重中感到轻松。

凡是在上海经历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都知道全上海学生造反派组织主要有三派：

“红革会”（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后来在复旦校内改称“新复旦”；

“红三司”（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后来在复旦校内改称“红复旦”；

“炮司”（“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其骨干原是复旦“孙悟空”战斗小组，后该小组扩大为“东方红公社”，第一次炮打失败后，这一派和红三司的一部分人在复旦组成“八·二五串联会”。

这三派名称虽有变化，但三足鼎立的局面，一直存在；它们之间人员也互有流动，但骨干分子基本没变。

若要将我归派，则应该属于“红三司”这一派。“红三司”司令安文江和他所在的“过河卒”小组的成员都是我的学生，与我关系不错。当我在运动初期挨整时，他们支持过我，使我摆脱险恶的处境，而且承蒙他们看得起，接纳我参加“过河卒”小组，算是一名老卒。所以，如果将我定为安文江的军师，还勉强可以说得过去，虽然在中央文革小组大捧红卫兵的情况下，当时处于被动地位的教师根本指挥不了学生，但毕竟我们关系较为密切；而将我定为“胡守钧小集团”的军师，要我对他们的行动负责，那就使我有荒唐之感了。

我虽被定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第四号人物，被戴上“狗头军师”、“黑谋士”、“摇鹅毛扇的人物”等诸种帽子，但是说来惭愧，其实我与他们并不是一个派别，对他们的情况并不了解，写这段往事还得临时采访。

我与胡守钧不是一派，相识很迟，而且有过争吵。1967年春天，我代表“红三司”对复旦中层干部讲话，提出要解放干部，不料我讲话刚一结束，胡守钧就站起来，当众批评

我的讲话有严重右倾的错误，令我很不高兴；1968年成立校革会前夕，他认为我在一张大字报上攻击了他，也对我很生气。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因为属于不同派别，大家虽然认识，也有往来，但总是各自严守秘密。他们的事，我既没参加，也不知情，所以把我放在胡守钧集团中整，使我感到既沉重又轻松，——反正他们的事都与我无关，看你们能整出什么名堂来？

上海市革会的头头们要整胡守钧这批人，是久矣夫非止一日的了。市革会副主任徐景贤曾经当众宣布：“胡守钧脑后有反骨。”这就是说，他们对胡守钧是极端的不放心，把他看作魏延，必欲除之而后快。手握政权的大人先生们对于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娃娃如此害怕，说起来非常可笑，但只要一提起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张春桥本人以及这批靠张春桥提拔上去的新贵们，的确胆颤心惊。

第一次炮打事件是胡守钧和他的“孙悟空”小组发动起来的。第二次炮打事件虽说与胡守钧无关，但是，胡守钧的名字印入张春桥的大脑皮层太深了，所以这笔账仍然要算到胡守钧头上。

张春桥对胡守钧实在太恨了，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整他。军宣队进驻复旦时，张春桥的亲信就训示说：“胡守钧很阴，你们要很好注意。”所以1968年初军宣队以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就已整过胡守钧一次，并且把胡守钧、周谷声等人长期关押起来，直到“四·一二”第二次炮打时，他们才有机会自救。在工宣队进校时，王洪文、王秀珍就特别指示：“复旦有过两次炮打，要查清。”张春桥虽然假惺惺地说：“炮打的问题，算了。”不过，官场上的语言，常常是不能直解，而需反训的。俗语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机灵的部下很能懂得上峰的言外之意，所谓“算了”，就是“不能算了”，要狠狠打击报复的意思。所以王洪文、徐景贤随即发布指示道：“这个账要算的。春桥自己当然这么说，但我们对这个问题还是要搞清楚。”工宣队的头头们当然心领神会：他们进驻高等院校，特别是进驻复旦大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查清两次炮打张春桥的问题，并且要狠狠打击策划炮打的头头。所以他们一进校，就来个全面大搜查、大抄家，然后才慢慢收网，把目标集中在胡守钧和他的伙伴身上。“一打三反”运动正为他们提供了打击报复的好机会。

张春桥要整胡守钧和“炮司”的人既然由来已久，当然也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是为什么把我也放在胡守钧集团里整，而且还抬得很高，说我是他们的军师，是决策人物，就连我自己都有些莫名其妙了。开始我还以为是工宣队的情报搞错了。但听听批判会上揭发我的材料，似乎他们什么情报都没有掌握，所揭的无非是些（又鸟）毛蒜皮之事，如：在游泳池里，我与两个“胡守钧小集团”的人边游泳边谈话；我的学生从新疆回来，到我家做新疆拉面吃，胡守钧跟着来吃过一次面；我到南京看女儿时，周谷声陪我游了一次石头城，等等。但是，这些生活小事却都归结到一个要点上，就是：吴中杰通过种种接触，为“胡守钧小集团”出谋划策；或者说，“胡守钧小集团”干什么大事都要征得吴中杰的同意。内容的琐碎和题目的惊人，完全接不上榫，显然，是工宣队定好调子要这些人揭发，于是他们只好把与我的几次见面一一作了交代，连点头打招呼、寒暄问好都往“出谋划策”这个纲上挂，其牵强附会，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的。

尽管牵强附会，缺乏材料，毫无根据，但他们还是将我定为“胡守钧小集团”的黑谋士，而且一定要把各种材料都改造得适合于这个罪名。记得1955年批判胡适的时候，许多文章都指责他“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是实用主义的伪科学，其实，胡适是讲“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还是比较符合科学精神的。他的考证文章就有许多材料作为证据，并非信口乱说。但现在呢，工宣队的做法简直是“胡乱的假设，粗暴的求证”了，或者根本就不要什么证据，也不知这该称为什么主义。大概“革命样

板戏”《沙家浜》给他们的印象太深了，他们认为胡司令的身边总该有个刁德一，所以就把我派作胡守钧的黑谋士，称我为刁德一式的人物。这简直是按照剧本来指派生活的角色了。

但是，为什么要派定我来扮演刁德一这个角色呢？我在什么地方触犯了他们？

在一次小型批斗会上，我终于恍然大悟了。这次会，参加的人数不多，不是为了制造声势，而是为了追查问题。他们翻来覆去地追查的就是一个问题：1967年初我两次去找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目的何在？谈些什么？整理了哪些材料？

呀，原来他们怀疑我在整姚文元的材料。

说起此事来，连我自己也感到好笑。“文化大革命”冲击了一切业务活动，而我却还记挂着我的鲁迅研究工作。除了钻研鲁迅本人的作品，阅读二三十年代的报纸刊物外，我还访问过许多当事人，姚蓬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之访问姚蓬子，并非因为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而是因为他曾经是30年代左翼作家联盟的活跃人物，且与鲁迅有过接触，鲁迅还赠过他一首诗：“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但在我访问姚蓬子时，姚文元已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姚蓬子也被保护起来，不准别人随便找他了。我千方百计地找到了他。姚蓬子很健谈，第一次没谈完，他又主动约我再谈一次。他谈得很坦率，不但谈了左联情况，介绍了鲁迅赠诗的背景材料，而且还主动谈到他转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后，在天津被捕的事。为了避免嫌疑，我当然不提姚文元，但在当时，姚文元正是他的骄傲，也是他的保护伞，他自己把话题引到姚文元身上。自然，讲的是姚文元从小如何聪明伶俐之类，决不会损害他的形象的。但即使如此，我却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重要嫌疑犯。无论我怎样解释，说这是为了研究鲁迅而进行访问，但工宣队总是不肯相信，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文学研究是怎么回事。按照他们的逻辑，你如果不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找他父亲干什么？既然你找过姚蓬子，而且又谈到他被捕的情况，这就是整姚文元的黑材料。如果你要研究鲁迅，鲁迅自己的作品还不够你读的，要去看30年代报纸杂志干什么？你看30年代报刊，一定要整张春桥的黑材料，甚至是整江青的黑材料。他们不但如此怀疑，而且在批斗大会上就是这样质问我的。哦，他们还怀疑炮打时学生们抛出的张春桥历史材料是我提供的，所以才那么抬举我。

还有一件事也与此有关。就在我被隔离之前不久，1969年年底，《解放日报》约我编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一不留心，我把鲁迅在书信中批评姚蓬子的话也编了进去，因为内容有相通之处。虽然并没有点姚蓬子之名，但鼻子特灵的人马上就嗅到了。这组语录一见报，就传来一个消息，说市革会朱永嘉说这组语录有问题，在查问是谁编的。当时我听过就算了，并不在意，现在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

我终于明白，自己是犯了“可恶罪”！

鲁迅写过一篇十分简短而又非常尖锐的文章，叫《可恶罪》，文中说：“我以为法律上的许多罪名，都是花言巧语，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记得1968年春天的那次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领导者曾经给胡守钧扣上许多似是而非的罪名，我看完批胡专栏大字报后，曾经对知己的学生说过：“胡守钧其实只不过犯了‘可恶罪’，因为他炮打张春桥，使上峰感到可恶，这才一条一条定出罪状来。如果不可恶，他这些材料都上不了纲。”想不到这“可恶罪”如今也落到我自己头上了。既然我成了“可恶的人”，当然就难逃挨整的命运。至于放在“胡守钧小集团”这个案子里整，还是以别的什么名义来整，那就带有随机性了。现在“胡守钧

小集团”案是上海市第一大案，而张春桥、姚文元二人又是连体婴儿，我既被怀疑整姚文元的黑材料，当然也属于炮打张春桥一案的要犯，把我放在这个案子里整也是必然的。

当悟到这一点时，我才觉得自己原先以为工宣队情报错误，等待他们查清后来解脱我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什么错误，什么罪状，都是假的，既然是“可恶的人”，还怕定不下罪名？古人不是早就说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得要定下心来，与他们慢慢地周旋。

（未完待续）

□ 来源：吴中杰：《复旦往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  
【难忘岁月】

风起云涌的日子（下）

• 蒋国辉 •

（上接 z k 1 9 1 0 c）

### 三、云扰幅裂

我步行串联的那段时间，“八·一五”造反派在各个领域势如破竹，大、中学校的“思想兵”和厂矿的“工人纠察队”组织摇摇欲坠，成员纷纷倒戈。我回到重庆后，开始参加自文革以来真正有组织的“革命活动”。

“思想兵”垮台以后，我们学校成立了大大小小数个组织，其中有一个叫做“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附中分队”，几个成员都是我比较熟悉关系不错的高中学生，我参加了这个组织，主要是跟着西师“八·三一”的大学生们，上街刷写标语什么的。

没过多久发生了“二月镇反”事件。我们当时只知道是政府镇压造反派，并不知道事件的原委是坚持大破大立的中央文革和维护传统的老军人们发生了强烈冲突。受中央文革支持的各地造反派，在同一时刻遭到各地专政机关的镇压，重庆“八·一五”派也在劫难逃，各单位造反派组织的领头人物都被送进了监狱，西师“八·三一”的几个风云人物无一幸免，尽数被抓起来关进了北碚公安分局的看守所，还几次戴着手铐用囚车押回西师来批斗。用那个年代很时髦的语言来描述，叫做“黑云压城城欲摧”，一时间造反派全都成了反革命。

都以为文化革命就这样结束了，家长们更是肯定这是1957年反右斗争的重现，坚决不同意我再去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但那时家长对子女的管束已经非常有限。我还认为这是赶上了白色恐怖——就像大革命失败，一切都转入了地下。我常常背着家长晚上和同学一起上街去贴标语，参加辩论，紧张、刺激、还特别悲壮。

到了4月，中央文革占了上风，老元帅老将军们支持的“二月镇反”变成了镇压革命小将的“二月逆流”，被抓的造反派组织头头全部释放，造反组织又大张旗鼓地恢复了活动，而且声势比以前更加浩大。

在上海“一月风暴”夺权之后，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响应中央文革的号召，纷纷起来向当地的最高党政机关“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新一轮的两派之争又开始了，斗争从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再到冷兵器肉搏，最后发展成为使用现代化武器的立体战争，坦克、大炮、舰艇都出动了。

重庆的“革联会”成立后，西师“八·三一”作为重庆“八·一五”派的元老，认为“革联会”是旧势力复辟，要砸烂它；另一些“八·一五”派的元老则要保卫“革联会”，原来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我们附中的“八·一五战斗队”此时也分裂了，成立了对立的两个组织：一个叫“无产者”，另一个叫“布尔什维克”。“无产者”这个组织在武斗中名声非常响亮，几个头面人物都不惧死亡，打起仗来冲锋陷阵在前，而且刺刀见红毫不手软，在北碚区的“八·一五”派中“无产者”是一张王牌。1967年夏天，“无产者”的一、二、三号人物以及一个支队长，都在攻打“八四五”兵工厂的战斗中阵亡了。

刚开始，重新划分的两派之间的斗争方式依然是写大字报互相攻击、辩论、游行等等，还和文化沾着点边儿。后来出现了骚扰和围困游行队伍、拉扯推搡对方等小摩擦。一次，北碚的“反到底”派在体育场集会后游行，队伍行至人民会堂附近，“无产者”的成员突然冲进队伍撕抢旗子，还亮出了匕首。匕首亮相，标志着两派纷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武斗开始了。

最初的拳脚棍棒很快遭到淘汰，取而代之的是钢钎——将建筑材料螺纹钢截成一两米长，再将一头磨尖，功能跟古代那种叫作“矛”的兵器差不多，至此，斗争进入了可以杀人致死的冷兵器时期。

冷兵器时期，北碚区的众多组织中，十三中的“九·八战斗团”独占鳌头，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团结一致的拼死决心和古代罗马兵团那样的作战方式——排成方阵，端着钢钎，喊着口令，一步一步逼近对方，再开始拼杀。其实真正拼杀的机会几乎没有，对方见到这个泰山压顶的阵势，不等他们走近就掉头逃跑了。其间，“九·八”最“辉煌”的一次胜利，是用这样的方阵打败了天府煤矿的工人组织“三·一八兵团”。

在打败了“三·一八兵团”后，“九·八战斗团”打算和“无产者”作最后的较量。那是1967年5月的一个晚上，“九·八”的武装人员到了附中，和附中“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人员联合起来，铁桶一般把“无产者”围在图书馆楼上。狂热的学生不怕天不怕地不怕死也不怕杀人放火，在几次进攻冲不上去的情况下，就作了一个疯狂的决定——火烧图书馆大楼，放言，楼上的“无产者”不投降，就把他们全部烧死。

幸好还没来得及放火，驻北碚的五十四军高炮团7891部队派出的一连士兵就赶到了。解放军神兵下凡从天而降，把“无产者”从绝望中解救了出来。士兵们强行将围攻的人群驱散，用身体砌成人墙把“无产者”保护起来送出了学校。眼看就要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九·八”和“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们气得捶胸顿足，但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训练有素的军人保护着“敌人”离开了战场。

冷兵器时期，北碚区最轰动的是西师校园内发生的“六·五一六·八事件”。起因是“八·三一”要将对立派“春雷”赶出他们据为总部的学院图书馆大楼，乃至把“春雷”挤出西师。“春雷”坚决不离开，把大楼变成了他们的战斗堡垒在里面固守。“八·三一”就武力攻打，并到中学请求援助。冲动的中学生就像充满气的皮球，轻轻一拍就蹦得老高，我们迅速卷进驰援“八·三一”的战斗，并三下五除二利索地把图书馆大楼攻打下来了。



我们取得胜利后，北碚其他“八·一五”派的组织闻讯赶来声援“春雷”，把夺取了图书馆的我们反包围在里面，一场血腥的战斗就这样发生了，虽然武器只是钢钎匕首木棒和石头，但双方都有不少人员不同程度地受伤，还真的死了人。我现在已经忘了事件是怎样结束的。我们被围困的那几天晚上，我在图书馆大楼一侧的屋顶上守着一架探照灯，不停地扫描楼下的那些黑暗角落，防止敌方偷袭。图书馆失守后，其他人怎么逃出去的不清楚，我仗着熟悉地形，从图书馆后边书库的窗户跳出去，跑了。

武斗开始不久，因驻军的支持，“八·一五”派很快占了上风。整个北碚城区被“八·一五”派完全控制了，只有以西南师范学院为界通往青木关方向的大片地区（包括两所大学，两所部队院校和两座内迁的大型工厂以及广大农村），还在“反到底”派手里。对于我们来说，城区里是一片“白色恐怖”，我们基本无人敢单独前往，因为每个学校都分成了势不两立的两派，熟人太多，进入对方控制的区域都有被“点水”被抓捕乃至丧失生命的可能，比解放前在白区开展工作的地下党还危险。

我们中学生撤退后集中在西师。附中的人员住在西师前院长兼党委书记家里，这一楼一底的小洋楼，我们二三十个人住进去，楼上还有一半的房间空着。院长和他的夫人作为“走资派”被打倒后，一家五口不知赶到哪里去了。院长是南下干部，行政级别与当时重庆市委书记相同。文革前这些人家都“侯门深似海”，老百姓并不了解他们。“文化大革命”撩开了掩盖着他们的那层神秘面纱，让普通老百姓有机会看到他们豪华的真实生活。这个事实，恐怕也是文革烈火燎原、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奋不顾身抛头颅洒热血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因之一。

我们退守西师，对立派经常来进攻骚扰，发生冲突最多的两个地方：一个是文星湾一带。好几次我们的人在那一带巡夜，被对方从围墙外用小口径步枪击伤。另一个地方是水岚垭附近。

水岚垭是1950年代初修建渝南公路时，将一座小山凿开而形成的一段峡谷，长有一百多米，宽是一条两车道的公路。两边是垂直的绝壁。我上小学时，亲眼看见一个人从陡壁上掉下来当即毙命。峡谷的一边是西师的校园，另一边是不多的民房。我们在西师校园这一边堆了很多石头，准备对方来进攻时就用擂石防御。都清楚这里是易守难攻的地方，擂石没派上用场，只有一次，对方从对面的山头向我们这边扔石头，我们用这些石头进行了还击。因为距离远，用手扔达不到预定位置，有人就想出了办法，将宽大的橡皮筋绑在条凳的两条腿上做成大弹弓，可以将小皮球那么大的石头射到对面。我试了试，发射了一颗石头，把对方用来做盾牌的门板打断了，足见威力不一般。

在西师我们停留了一个月左右，又撤退到了西农。这时，比中学生懂得珍视生命的大学生们早就散了伙，保持着队伍的，只有十三中“九·八”和我们附中“布尔什维克”，还有少数二十三中、二十四中、四十四中的学生跟着。退守到西农的所有中学生合并组建成了一支队伍，一直保持到武斗第一个高潮结束。其时，驻守西农的还有一个叫“猛虎团”的组织，成员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不论派别，都把信仰高高地置于生命之上，走南闯北“干革命”，很多人还宁死不屈，真正抛头颅洒热血了。记得我们驻扎在西农的武斗团体曾经组织了一次袭击对方“据点”的行动。袭击地点是鸡公山上的龙驹寺（一个农村生产大队所在地）。挑选的突袭人员名单中没有我。当时，我为没得到这个保卫毛主席的机会沮丧至极。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庆幸当时没被选中，否则这一辈子会因良心折磨而永无宁日。

那些参加了行动的人回来说，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只找到一个女青年。这个女青年是西师教育系的一个学生，叫杨素芝。也不知袭击人员到底想从这个女大学生嘴里问出些什么，女青年表现得像渣滓洞的革命志士一样，在审问者面前一言不发始终沉默。“猛虎团”的突袭队员用钢钎把这个女学生捅死了。几个参加行动的附中学生无限感慨地说：那个女的真是坚强，被钢钎一下一下捅得鲜血直流也不求饶，就像江姐，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的嘴唇，在她面前，我们只觉得她是当年的革命志士，而我们这些人就像国民党匪兵。

在以后真枪真炮的战斗中，双方像这位女大学生那样为“革命”献身的人，更是不计其数。特别是年轻的中学生们冲锋陷阵异常壮烈，他们的行为让人想得起来的只有“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前赴后继，英雄辈出”这些词汇。武斗刚结束时，重庆的许多著名景点——如大田湾体育场的花坛、黄山、鹅岭公园和枇杷山公园等等，都埋葬着两派在武斗中遇难的人员。我们学校“无产者”那几个阵亡的头头，埋在了学校教学中心的花坛里。后来，所有的“烈士墓”全部被挖除，“烈士们”的骸骨最后怎么处理了无人知道。那些虔诚地为理想和信仰而战斗牺牲的红卫兵们如果在天有灵，看见自己死无葬身之地，该作何感想啊！

重庆是国家重要军事工业基地，除了原子弹以外，生产几乎所有的常规武器。钢钎匕首很快被热兵器取代，武斗升级了。武斗最激烈的时候，市区的街道上开着空气压缩机厂生产的坦克，长江里游弋着望江机械厂生产的“海四联机枪”装备的登陆舰，鹅岭、枇杷山上架着江陵厂生产的大炮。各种型号的轻重枪械更是随处可见。由于多数兵工厂占上风的是“反到底”派，在开始动用火器的时候我们的武器大大地优于对方，我们使用建设机床厂生产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时，对方还只有从当地人武部拿出来的“汉阳造”或苏式步骑枪。

我们从建设厂弄到的第一批“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只有九十支，队伍里的学生有一百几十人，怎么分配就成了问题，头头们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第二天宣布持枪人名单时，我在九十人之列。高兴之余我真是深感意外：很多出身“红五类”的同学都没得到枪，为什么是我？果然，发枪后就有几个“红五类”跑去找头儿要说法，他们很激愤：蒋国辉不是工农出身，凭什么第一批持枪？头儿回答：现在又不是“思想兵”时期，谁还看出身？现在看的是勇不勇敢，打起来敢不敢往前冲！

武装起来之后，我们没有停留在北碚跟“八·一五”较量。我们离开了西农。这次离开不是因为顶不住对方的进攻，而是和“猛虎团”闹了矛盾。中学生们还十分单纯，看不惯在社会上已经混了多年的“猛虎团”成员的某些作风，小摩擦时有发生。头儿们为了避免内讧，就主动带领自己的队伍撤离了西农，驻扎在离北碚二十来公里的青木关。

我们在青木关住了不到半个月，璧山县的“反到底”派人来联系，告知当地“八·一五”很是猖狂，他们眼看就要被赶出县城了，请我们去支援。离开西农后，大概我们的“粮草”供应也有些问题，支援他们，“粮草”问题也就解决了。于是，我们全体人马开到了璧山县，其后，我们只是在县城主要街道上武装游行了几次，就把对方镇住了，他们悄无声息地撤离了璧山。

此后，当地的“反到底”有些得寸进尺，“请”我们协助他们搞一批武器，我们也觉得义不容辞，就无法无天地去当地的驻军军火库抢枪。当时好像上边有命令：不能对地方的群众开枪。所以莽莽撞撞的我们没遇到什么阻拦就进了军火库，拿了不少手榴弹、子弹、步枪，甚至还有双联高射机枪。从军火库旁边的一间屋子门口路过时，我看见两具穿着崭新军装的尸体。军人说，这是被抢武器的人开枪打死的。看来这个军火库已经不止一次被抢了。看得出来军人们早已满腔怒火，只因上边有命令，才没碰我们（几个月后第二次武斗高潮再

起时，命令改变了。虽然没有指明可以直接射击冲击军火库的人，但明令军人坚决保卫军事物资，军人们就放开了手脚。我们的队伍回到了重庆市区，枪支弹药已经全部上缴。可是对方在驻军的默许下还保留了武器。一支赤手空拳的队伍无法跟对方抗衡，只好去抢驻军的军火。这次行动不再像在璧山那么好运，愤怒的军人坚决开枪阻击，打死了四个人，其中有十三中“九·八”的“军事领袖”王朝贵）。

在璧山，我们一百多人住在县委的礼堂里。天气炎热，无需被盖，人们都直接躺在礼堂的长条靠背椅上睡觉。一天早上，大概七点钟左右，我突然被一声枪响和剧烈爆炸声惊醒，还没回过神来，又是一声巨响。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糟！被敌方包围了！抓住枪翻身滚到地上，拉开枪栓开始寻找射击目标。可是两声爆炸之后，除了刺鼻的硝烟味，再没有什么枪声爆炸声，倒是听见一片哭叫声。过了约一分钟，我从地上站起来，周围的人也纷纷站起来，只见靠近侧门的长椅附近，血肉模糊地倒着几个人。

一阵忙乱之后才知道，原来是附中一个姓陈的学生，早起没什么事，就坐在椅子上擦手枪。他旁边还有几个起得早的人，围在一起闲聊。陈同学的枪突然走火，子弹射中了他斜对面那个叫潘经中的学生，又从潘的腰部穿过打在了其腰间挎着的手榴弹弹柄上。潘本能地用手去捂伤口，开口骂“陈××，我×……”还没骂完，被打燃了导火线的手榴弹就爆炸了。这就是我在梦中听见的一声枪响和一声爆炸。潘腰间的四枚手榴弹被炸飞，其中一枚又被引爆，幸好是滚在门口那一枚，而不是飞到礼堂中央那两枚，所以第二次爆炸没有伤人，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我们围过去时潘经中倒在地上，右手的手掌被炸得只剩无名指和小指，大半个手掌没有了。臀部被炸掉了一半，一片骨渣和碎肉撒在他身边一两米的范围内。潘起初还大骂了几声，很快就陷入了昏迷状态，嘴里不时喊几句胡话。

其他几个被弹片擦伤的人，稍微包扎一下也就没事了。但是，有一个起初没被注意到的重伤员，也是附中的学生，叫杜昌元。一块弹片从他前额打进去，没有流血，甚至连伤口也不显眼。大家都以为他伤得不重，所以一直等汽车来了才把他送到医院。而他受伤后立即昏迷不醒，一声也没有吭，直到三天后默默地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七手八脚地把潘经中抬起来就往医院跑，潘被送进急救室，我们和许多当地人自觉地组织起来献血。无奈当时在一个小县城里，医疗水平有限，医生没有抢救伤员任何经验，连采取什么急救措施都搞不清楚，只是任他躺在急救室里给他输血和打吊针。我和几个同学守在他身边，将他的手和脚按住，避免因他不停地扭动把身上插的输血输液管扯掉。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扭动越来越无力，喊叫声越来越微弱，他在我们的眼前咽了气。我们走出急救室，看见自愿献血的队伍还排得长长的……潘经中就这样十分冤枉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县医院的医生告知，另一个重伤员他们也无法抢救，要我们抓紧时间赶快送往永川地区医院。我们马上把杜昌元抬上一辆卡车，往永川开去。当时的公路是碎石路面，车是解放牌的卡车，颠簸得厉害，我们几个轮流坐在他身边，小心翼翼用手托住他的头。他却悄无声息。到地区医院两天之后，我们得到通知，杜不治身亡。

那位闯祸的同学，是个初一的学生，他倒是奇迹般的连根汗毛也没伤着，可是人已经吓懵了。事发后他就有些魔怔了，呆呆坐在那里嘴唇不停的蠕动，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一些急性子的同学冲到他跟前骂他、打他，甚至有人要把他拉出去毙了。他像一块木头任由别人拖拉推搡拳打脚踢，不反抗甚至也不挣扎。几个头儿比较冷静，把他带到一边看守起来，

不让激怒的学生接触他，否则，当天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悲剧。此后几个月，这个同学精神完全垮了，整天不说一句话，木木呆呆没有任何表情，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独自坐在一个角落里发愣。队伍在永川解散后，我就再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 四、枪林弹雨

我们在璧山县城也没有住很久，又转移到了永川。第一次真正荷枪实弹的战斗，发生在永川。

一天晚上，“上边”下达命令，让我们去攻打县城几十里外一个由对立派“专联司”占据的乡镇。晚上10点钟左右乘车出发，在某个地方停下来吃了饭，又领了许多面包，然后开始夜行军。天快亮的时候，队伍停下来，让我们就地隐蔽待命。周围是庄稼地，开始我们还纷纷寻找隐蔽的地方趴下来。趴了个把钟头，天大亮了，环顾四周根本看不到任何“敌人”的踪迹，大家就放心地坐了起来，还大大咧咧掏出面包来啃。一直等到将近十点钟，才有命令叫继续前进。

前进时间不长就远远看见一个集镇，想必就是我们这次进攻的目标了，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集镇方向传来了枪声，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分散开来，毫无作战经验的一群中学生，只凭自己的感觉和从战争电影中学到的“经验”，猫着腰借着隐蔽物慢慢向枪响的方向靠近。前方的枪声和爆炸声有一阵十分激烈，我们到达时已经平静了。我记得没有遭遇什么抵抗，我们兵不血刃就开进了集镇，连放枪的机会都没有捞到。

其实，真要遇到了抵抗，我们也不可能有组织地攻打，只能是各自拿着枪瞎打一气罢了。不过，我们的武器在当时可算十分精良，清一色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还有一挺五六式轻机枪。而永川当地的武斗人员，手里只有“老套筒”，就连当地军分区的独立团，使用的也不过是苏式步骑枪。仅就武器装备而言，我方算得上是正规的野战部队，对方则只能算作游击队，双方真的交上火，我们在火力上肯定占上风。

在镇外的小山坡上，我看到了战斗留下的痕迹：一个直径约两米的坑里倒着六具尸体，其中一个的头颅被整整齐齐地从耳朵以上削掉了，脑髓就像快刀切开的西瓜瓤。坑里的积血有几厘米厚，还没完全凝固。看来是被手榴弹炸中了。

我始终没搞清楚究竟谁把谁打败了？按理，取胜的一方应该留在集镇里，但我们进去的时候，集镇上见不到任何武装人员。当晚在集镇的小饭馆吃饭。那天的菜是烧猪血旺，我一点也吃不下，眼前晃的全是那些被炸死的人和没有凝固的鲜血。

那以后不久，我们就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在全川甚至全国都出了名的“武装支泸”。在我们亲历这场“战斗”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次事件的波及面会这样广，后来还听说，某些不怕死的“战地记者”把我们“打仗”的场面拍成了电影纪录片，被部队拿去作为教育新兵的内部教材。“武装支泸”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战斗”，给我们“参战”人员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也给很多家庭带来了永远的伤痛。

整个事情的起因我不清楚。我所知道的是，泸州“红旗派”来人向我们求援——当时，我们这支重庆市北碚区反到底派的中学生武装力量在川东南一带已经小有名气——，他们告知，泸州天然气化工总厂的“红联站”十分猖狂，武器又好，把“红旗派”打得在泸州快站不住脚了，眼看泸州市区就要失守。

接到告急，头儿们立即决定派队伍支援处于危急状态的战友。事实上，我们队伍的全体“战士”包括头儿们在内，都是拥有满腔热血而缺乏基本军事素质和经验的青少年，完全没有也不懂得考虑和制定正规的行动方案。头儿们紧急集合了两个排（我们全体人员编为三个排，每个排约四五十人），第二天上午就出发了，留下一个排待在永川作后备力量。

从永川到泸州只有一百来公里，但那时的路况不好，我们午后才到了泸州郊区一个叫兆雅的小镇住下来，并被告知明天进攻就从这里出发。晚上，当地的革命组织招待我们打牙祭，想必是因为第二天会有一场恶战，因为中国的传统是给将要去赴死的人好好吃一顿。吃饭的时候，年轻的热血男儿们倒是没有想这么多，但对于我们中间的不少人，这顿饭真的成了“最后的晚餐”。

晚饭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大仓库里睡觉。那一夜好像所有人都没睡踏实。我们虽然小有名气，一些派性小报上也吹嘘我们这支队伍“英勇善战”，其实我们心里明白自己是什么分量。从我们得到真枪实弹组成武装队伍一路走过来，真正意义上的仗并没有打过，又没受过起码的军事训练，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打。之前我们的胜利，基本上是靠配备精良的武器，来一次武装游行震慑对方取得的，真要上战场了，谁声称自己不紧张不害怕，那才是怪事。我看见两个十三中“九八”的初一学生，他们并排面向墙壁坐了很久，嘴里念念有词：老天保佑，明天不要把我打死了……然而，次日他们双双被打死在战场上。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出发了。走了约一小时的路程，被告知前边就是泸天化“红联站”的控制区。这时从前方传来了枪声，我们迅速分散，利用近处的小山丘隐蔽起来。不久，有人说山沟对面就是对方的火力点，我们也确实看见那边有射击的火光，于是，所有的机枪步枪一齐朝那个地方倾泻子弹。我记得那一下我打出了十四发子弹，这是我在整个文革武斗期间唯一的一次向“敌方”开火。

子弹流星雨一般落在对方阵地上，对方似乎没了动静，我们以为“敌人”被消灭了，或是撤退了，就开始移动，也就是进攻。我们这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只是一群拿着精良武器的“乌合之众”，绝大部分人确实敢打敢拼，但怎么打就完全外行了。战前没有作战方案，战斗中没有人组织、指挥，所谓“进攻”，不过是人人按自己的想法——确切地说是根本没有想法，只管往前冲就是了。

冲着冲着，我发现自己周围就只剩三四个人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跑得太快，冲到了最前面？此时我们几个成了所有火力聚焦的中心，正前方和左右两边都在向我们打枪。好不容易冲到了一座农舍后边，前方密集的枪弹把我们挡在了那里，再也不能前进。在农舍的墙后边只能躲避前方射来的子弹，左边的子弹依然密集地擦着头皮而过，有的打在离我们不远的地面上，土皮“扑、扑”地飞溅。看情形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我们只好后撤。

农舍的右边有一道齐胸高的土坎，那后边可以躲避从左边射来的子弹。看好了地形，我的动作突然变得十分敏捷和果断，仿佛真正受过训练的士兵就地一滚到了土坎下，迅速站起来一步跃过土坎，趴到了一笼竹子后边。刚刚匍匐下来，就听见“扑、扑”的几声响，一串子弹正好打在我刚才起跳的地方，跟在电影里见过的一模一样。看样子对方肯定是看准了我们这个目标在射击。

跟在我后边跳过来的，是一个其他学校的学生。他在我的旁边趴下来后，抬起头想看看。就在那一瞬，又是一串子弹打过来，只听他“哎呀”一声，我掉头一看，他的左眼没有了，只剩下一个鸡蛋大小血糊糊的洞。我赶紧把他拉下来仰面躺着，不一会那个洞开始往外冒血。幸而这时我们学校两个做战地救护的女生赶了过来，我们七手八脚把他拖到农舍墙根

下，往他的伤口里塞药棉，扎绷带。开始，他还不停地问，我的伤在什么地方，眼睛是不是好的……不久就失去了知觉。在给他包扎伤口时，一个女生又被子弹打中，还好这颗子弹“落”在了她的手腕上，伤得不重。

两个女生告知，大队伍已经撤到后边去了，她们也正在撤退，恰巧遇见了我们。我们立即抬着伤员往后撤。子弹在头顶“嗖、嗖”地飞，我们跑几步，趴一阵，再跑几步……一路上看见我们的零散人员，就招呼他们一起撤退。一个二十四中的学生，刚从他隐蔽的田坎后边站起来，就被一发流弹击中。当时看他的伤似乎不重，子弹从肚脐一边的腹壁打进去，又从另一边的腹壁钻出来，血都流得很少。他自己坚持跟我们一起步行，直到有车来接伤员，他才上车和我们分别。没想到，当天晚上他死在了医院里，不知是伤到了什么要害。还在永川的时候，一个十三中的学生在拿枪时不留神把手指压在了扳机上，枪口恰恰对准他自己，一串子弹射出来，他的胸部中了四发子弹。这么重的伤，所有人都认为他活不成了，他却奇迹般活了下来。他们两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更让我相信了“生死有命”这个说法。

我们一直撤退到山顶再也没有流弹飞舞的地方，才敢坐下来等待大队伍。但是，大队伍究竟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穿过了枪林弹雨，我感觉自己是坐在阴阳相“隔”的那个“隔离带”里，周围静得无边无际的，时间仿佛也停滞了。不知坐了多久，才远远地看见我们的人列着队走过来。战友相见，除了激动还有毫不掩饰的惊讶：你们还活起的呀？大家都以为你们被打死了！

那一刻，“活起的”这个字眼儿让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震动，生和死的界限对于我们就是一颗子弹的落点啊！十几年的生命历程中，饱受英雄主义教育的影响，我似乎一直都在追求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生命结束方式，可这时，当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挣扎出来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活着或许更加美好的感觉。

我们跟随大队伍在公路上走了一阵，看见了送饭和接运伤员的车。吃过饭，队伍就在原地休息，直到有车来接。

这一仗我们到底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我不清楚，不知道其他人清不清楚。来车直接把我们送进了泸州城，那以后，我们和对方再也没有过任何武装接触，应该说是我们这一派在泸州站稳了脚跟。

过了好久，我才从一份小报上得知，“武装支泸”是我们这一派的全川统一行动，泸州的“红旗”派组织得到了从四川各地来的援兵一举攻克了泸天化，将驻扎在那里的“红联站”赶走了。我们这支队伍不过是援兵中小小的一分子。

这时，一向比较喜欢思索的我才有点怀疑，我们那天究竟是在和谁打？那场战斗一片混乱，两派之间没有服装上的差异，没有任何可以区别的标记，同一派内部也根本没有统一的部署和指挥，进攻的目标和打击的对象都完全不清楚。战斗一开始，我们先是对着一个可能的目标胡乱放了一阵枪，然后端着枪冒着雨点般射来的子弹胡乱冲锋一阵。那些毫不手软地对准我们把我们当作野兔子一般射杀的人究竟是谁？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是在同其他来“支泸”的“自己人”互相混战！假如这是真的，我们那些“牺牲的战友”，就真是比窦娥还冤！

我不敢想下去了……

那天的战斗中我们损失太大了，所有人都阴沉沉的，谁也不说话，四周的空气也变得十分沉重，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来。我们一共“牺牲”了十三个人，包括前一天晚上面壁祈祷的那两个十五岁左右的初一学生，其中一个被枪榴弹把整个背都炸烂了。我们住在泸州医学院，伤员们都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里治疗，死者的尸体也在这里处理。很多人都去了医院太平间，看十三个死者被洗净、用白布裹好的过程。开追悼会时，十三具尸体在礼堂里一字摆开，看上去让人不寒而栗。

“牺牲”了十三个战友还不是我们那次战役的全部损失。第二天又从永川传来噩耗：留守永川的那一个排，不知接到谁的通知，告知我们在泸州打得很吃力，需要支援。留守排迅速派了二十个人乘卡车前往泸州，谁知半路上出了车祸，卡车翻到了几十米深的山沟里，四个人当即摔死。战斗减员加车祸，使我们这支总共一百三十多人的队伍，一下子就损失了十分之一，每个人都能明显地感觉到自己身边少了熟悉的伙伴，好些日子人们都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蔫蔫的。而所有那个年代里把生命定格在十几岁的少年，都犹如一颗流星，在父母的生命中划出一道耀眼的弧线，就消失了，给父母留下了永远的伤痛。

从战场上撤下来回泸州城途中，跟我们队伍一起的有几个对方的俘虏。得知我们死了那么多人，有人开始失去理智，几个学生弹起来冲过去把俘虏拉到一栋农舍后边，一阵乱枪枪毙了。多年以后，几个枪毙俘虏的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泸州回到永川后，再没有什么军事行动。大约在8月底9月初，中央发出了让群众组织交出武器的命令，并由各地驻军负责接收。由于驻军一直倾向于支持“八·一五”派，对收缴我们这一派的枪支弹药表现得十分强硬。本来我们也没有抗拒不交的意思，只是很担心，我们交了对方不交，如果冲突再起，没有了武器的我们只剩下血肉之躯，即便筑成一道新的长城，又能抵挡几颗枪子炮弹？所以盯着对方的动向拖拖拉拉不认真照办。后来军队实施强行收缴，我们才被迫全体交出武器。交枪的前一天，所有的人都跑到城外过“枪瘾”，对空射出所有剩余子弹宣泄内心的百感交集。那一天，整个永川城一片“噼噼啪啪”的爆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足足打了好几个小时，真是惊心动魄，乍一听有些像过年放鞭炮，身临其境却感觉毛骨悚然。

交了武器，我们这支队伍就解散了，我离开了队伍，直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时才回到自己的学校。

（作者简介：蒋国辉，1969年上山下乡，1972年招工到重庆打通煤矿当矿工，1977年考入大学，198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现定居德国。）

□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三届》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